

2.5g; 仝小林测得 30 枚大枣(产地为河北)的重量为 120g^[13], 即一枚大枣的平均重量为 4g; 畅达分别测得 30、25、15、12、10、6、5、4 枚大枣(产地未注明)的重量, 其结果分别为 105、87、52、42、35、21、17、14g^[14], 平均一枚大枣重量为 3.5g。鉴于柯雪帆与仝小林所测得数据差别较大, 我们认为, 若能测得张仲景当年行医地区大枣的重量, 或许更具有代表意义。实测南阳当地产大枣的重量, 随机多次测取 36 枚大枣的平均重量为 126g, 即平均一枚大枣重量为 3.5g。那么十二枚大枣的重量应为 42g, 根据大枣十二枚为三两的推断, 可换算出经方一两相当于今之 14g 左右。

5 小结

我们测算结果是经方一两合今之 14g 左右, 与朱晟根据《汉书》“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二十四铢为两, 十六两为斤”的记载, 且通过实测黍重法所得到的结果较为接近, 其结果为汉时一两等于今之 14.232g^[15]; 与刘复根据新莽嘉量所测得的数据(一两等于 14.1666g)较为一致^[16]; 同时与丘光明根据考古实物佐证和史料记载所考证的东汉一斤合今之 222g, 即一两合今之 13.875g^[17]数据较为接近。这些数据的相对一致性证实了前述相关推测的可能性, 证实了根据桂枝汤方义推算经方剂量的合理性。同时, 它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实了在经方剂量诸学术观点中, 大剂量组数据的可信性。

参考文献

[1]王伊明. 为古方权量正本清源[J]. 北京中医学院学报, 1986, 9(2): 10.
[2]成都中医学院. 伤寒论讲义[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

版社, 1964: 30.
[3]中医研究院. 伤寒论语释[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74: 8.
[4]陈家骅, 姜建国. 经方药量管窥[J]. 浙江中医杂志, 1981, 16(5): 204.
[5]江苏新医学院. 中药大辞典·附篇[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79: 762-763.
[6]柯雪帆, 赵章忠, 张玉萍, 等. 《伤寒论》和《金匱要略》中的药物剂量问题[J]. 上海中医药杂志, 1983, (12): 36-38.
[7]钱超尘整理. 伤寒论[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5: 26, 104.
[8]河北医学院校释. 灵枢经校释[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2: 186.
[9]王子接. 绛雪园古方选注[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3: 13.
[10]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17-18.
[11]李明亮. 中医的本意是中和[N]. 中国中医药报, 2010-5-27(3).
[12]聂惠民. 论《伤寒论》之和法[J]. 中国医药学报, 2002, 17(4): 199.
[13]仝小林, 吴义春, 姬航宇, 等. 《伤寒论》药物剂量考[J]. 中医杂志, 2009, 50(4): 369.
[14]畅达, 郭广义. 《伤寒论》药物中非衡器计量的初探[J]. 中成药研究, 1985, (8): 44-45.
[15]朱晟. 古今汤方剂量异同的考证[J]. 中医杂志, 1956, (10): 533.
[16]吴承洛. 中国度量衡史[M]. 上海: 上海书店, 1984: 72.
[17]丘光明, 邱隆, 杨平. 中国科学技术史: 度量衡卷[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1: 250.

(收稿日期: 2010-12-30; 修回日期: 2011-01-10)

[编辑: 李 巍]

费伯雄的“和缓醇正”说

赵 艳^{1*} 朱建平²

(1.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各家学说教研室, 北京市北三环东路 11 号, 100029; 2.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

基金项目: 中国中医科学院基本科研业务费自主选题项目(Z02010-23)

* 通讯作者: cmdzhy@163.com

[摘要] 费伯雄博学通儒, 医术精湛, 人称其以名士为名医者, 推崇李东垣温补脾胃、朱丹溪壮水养阴之法, 主张“和治”、“缓治”, 师古而不泥, 常以平淡之法而获效。

[关键词] 费伯雄; 和缓醇正; 医学主张

“和缓醇正”是清末费伯雄医学主张的核心, 主要是针对当时一些医家为邀射名利, 一味在处方用药上趋奇立异, 而不注重分析病情、辨证论治的医风

而提出的。费伯雄指出: “医学至今芜杂已极, 医家病家目不睹先正典型, 群相率而喜新厌故, 流毒安有穷哉!

救正之法，惟有执简驭繁，明白指示，庶几后学一归醇正，不惑殊趋。”^[1]所谓“醇”者，他认为“在义理之的当，而不在药味之新奇”^[2]，主张“毒药治病去其五，良药治病去其七”^[1]，这样归醇纠偏，才能达到机体的平衡。所谓“和缓”，认为“疾病常有，怪病罕逢，唯能知常，方能知变”，“疾病虽多，不越内伤外感，不足者补之，以复其正；有余者去之，以归于平”^[1]。

费伯雄认为，医和、医缓本是古代医学家，名为和、缓实则代表了一种平和务实、去除急功近利的思想作风，“和”则无迅猛之剂，“缓”则无急功之功。费伯雄指出：“天下无神奇之法，只有平淡之法，平淡之极，乃为神奇；否则眩异标新，用违其度，欲求近效，反速危亡，不和不缓故也”^[1]。这种观点蕴涵着深刻的哲理，疾病有其自身的演变规律，治疗过程也得遵循客观实际，讲究实事求是。不管出于什么目的，违背自然规律，一味追求新奇，往往事与愿违，加速危亡。故临证强调“一归醇正，不惑殊趋”，主张以平淡之法获神圣奇之效，最擅运用“轻可去实”之法，处方用药以轻灵见长，真正达到了醇正不杂之境界。

纵观费伯雄《医醇滕义》《医方论》等著作，无不贯穿着醇、正、和、缓四字。如曾治无锡顾某，症见中脘不舒，饮食减少，脉象左关甚弦，乃肝气犯胃之证。前医竟以大承气减量治之，所谓“重药轻投”，却罔效。费伯雄分析，盖仲景三承气汤，属斩关夺门之法，可救人于危急存亡之秋，但绝不可随便施用于寻常之症。本案仅为脾胃不和之小恙，但由于前医是“身负重名”之辈，如果使用寻常之法，就不能突出其名望，于是乎小题大做，以自我炫耀，结果事与愿违。费伯雄投以自制的抑木和中汤，药用：茯苓四钱，郁金二钱，青皮一钱，陈皮一钱，（炒）茅术一钱，厚朴一钱，当归二钱，茯苓二钱，白术一钱，木香五分，砂仁一钱，佛手五分，白檀香五分，抑肝理气和胃，用药平淡、和缓、轻灵，三剂即愈。遂慨叹：“医家敢于以药试人，病家亦甘于以身试药，此风日起，流毒无穷。予故不惮烦言，谆谆辩论，以为厌故喜新者之明戒！”^[3]

费伯雄强调醇正和缓，亦是为了保护正气，这从他治疗痹证的特色即可见一斑。如治风痹，认为“当以养血为第一，通络次之，祛风又次之”，“若不补血而先事搜风，木愈燥而筋益拘挛，殊非治法”，并再三强调“先用大剂补血祛风，后即加入参、苓、白术以补气分，营卫平调，方无偏胜之患”^[4]，故自制温经养荣汤，方以鹿筋、枸杞子为主药，合当归、白芍、生地黄、

熟地黄养阴血，桂枝、生姜、大枣调营卫，续断、独活、秦艽、桑枝、木瓜、甜瓜子搜风通络，再加木香以调气。从药味和剂量看，扶正药占绝对优势。再如治痛痹，自制龙火汤，用鹿角霜、肉苁蓉、肉桂等温养龙火，再以党参、白术、茯苓补气，当归、白芍养血，生姜、大枣、木香调营卫不在散寒之气，而在于调养气血，温通经络。治着痹，自制立极汤，以附子、莪术、补骨脂及党参、白术、茯苓、薏苡仁等补土扶阳气以胜湿，续断、杜仲等补肝肾，强筋骨，当归、独活、牛膝、生姜、大枣等利血脉和营卫。显然费伯雄治痹侧重扶正气，风痹养血，痛痹温阳，著痹补土扶阳，而祛风、散寒、除湿之品却寥寥无几，用药十分轻少，充分体现了和法缓治以护正气为本的学术思想。

再如费伯雄治遗精，以（炙）五倍子，研末，掺膏药中，敷脐，二三日一换，用之即愈。治久痢脱肛，脾有积湿，营血久亏，拟扶土和荣治之，先后选用：当归二钱，枳壳一钱，青皮、陈皮各一钱，木香五分，砂仁一钱，乌药一钱，荞饼四钱，车前子三钱，荷叶炭五分，潞党参三钱，连皮、茯苓四钱，（制）附片五分，生薏苡仁、熟薏苡仁各三钱等，两诊即愈。治癥瘕已久，拟消散和荣法，药用全当归二钱，大丹参二钱，香附二钱，红花八分，乌药一钱，橘核一钱，延胡索一钱半，川楝子二钱，枳壳一钱，木香五分，砂仁一钱，陈皮一钱，川椒目二十粒，降香五分，两诊癥块即松软。治疗吐血、便血、咯血等危重之证，治法仍宗和缓平淡之旨，每味用量最小三分，最大不过四钱，但疗效显著，确实达到了“平淡之极，乃为神奇”之意境。

值得一提的是，费伯雄也明确指出：“和缓醇正”并不是让医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一味小心谨慎，如他认为“仲景三承气汤颇为峻猛，而能救人于存亡危急之时，其峻也正其醇也”^[2]。

参考文献

[1] 费伯雄. 医醇滕义·序[M]. 清同治二年(1863) 耕心堂刻本.
[2] 费伯雄. 医方论·自序. 见: 清·费伯雄. 费伯雄全集[M]. 民国元年(1912) 常州孟河费伯雄铅印本.
[3] 费伯雄. 医醇滕义·卷一·重药轻投辨[M]. 清同治二年(1863) 耕心堂刻本.
[4] 费伯雄. 医醇滕义·卷四·痹[M]. 清同治二年(1863) 耕心堂刻本.

(收稿日期:2011-02-24;修回日期:2011-03-15)

[编辑:李 巍]